

永嘉学派课题研究文本

目录

大道	2
工夫	2
何为永嘉；何以为学派？	3
儒学为什么会发展出永嘉学派？	3
（一）“富庶而教”：有形可感的民本思想	3
（二）“法行仁政”：道德与制度相辅而行	4
瑞安与永嘉学派	4
永嘉学派的分期和主要代表人物	5
一、准备期（1078—1162）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	5
（一）僻远下州——温州学子千里求学	5
（二）伊洛之学——程颢、程颐及其思想	6
（三）俊豪先觉——元丰九先生	7
1、士有成才：赵霄	7
2、违志开道：周行己	7
3、执政忠直：许景衡	8
（四）程学南传——其源亦同自出	10
二、定型期：南宋孝宗朝（1163-1189）	12
（一）东莱启辙——探寻富国强兵经世致用之道	12
（二）于经无不合 于事无不行——薛季宣	13
三、鼎盛期：南宋光宗·宁宗朝（1190-1224）	16
（一）群英荟萃：务求知古如君举，尤喜能文似水心	16
（二）天下一变：事功主于经世	17
四、转型期：南宋理宗朝以后（1225—1276）	21
五、永嘉学派融入元明清思想主流	22
（一）程朱理学吸收永嘉学派思想	22
（二）阳明心学对永嘉学派的学习借鉴	23
六、历史评价	24
（一）鼎足而三	24
（二）欲集诸儒之大成	24
七、近代复兴	25
永嘉学派的主要思想和启示	26
一、哲学观点	26
二、政治思想	29
三、经济思想	34
四、文学成就	38
五、史学成就	42
永嘉学派思想的现实价值和当代启示	44

古代浙江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也都倡导义利并重，注重工商的思想，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而且深深地影响着浙江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浙江思想文化的重要源泉。宋代“永康学派”代表人物陈亮提出“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提出“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主张农商相补，反对义利两分。

——习近平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大省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3年7月18日

（选自《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第264页）

乾淳诸老既歿，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两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称鼎足。

——（清）全祖望

大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工夫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何为永嘉；何以为学派？

温州古称“永嘉郡”，宋代习惯以“永嘉”作为温州全域的别称。这个学派的代表性人物籍贯属于温州，故称“永嘉学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称其为“永嘉之学”“永嘉学问”。

清末学者邓实（1877-1951，广东顺德人）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发表的《永嘉学派述》一文中，“永嘉学派”一语才被正式提出。

地域性并未限制永嘉学派思想创新的视野和深度。它秉承了孔孟儒学关心民生、重视制度的大经大法，在吸收借鉴二程理学这一外来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深入反思南宋儒学不能经世致用的弊端；它虽然崛起于东南一隅，其念兹在兹的思想关怀却是“家、国、天下”。

儒学为什么会发展出永嘉学派？

孔子的“富庶而教”与孟子的“法行仁政”是永嘉学派思想的基因和源头。

（一）“富庶而教”：有形可感的民本思想

儒学的民本思想是有形可感的，具体而物质性的，落实为人民合理生活需求和生产需求的基本满足。孔子就教导弟子，治理一个地方的顺序应该是：“庶之（人口众多），富之（生活富裕），教之（施加教化）”。

孟子旗帜鲜明地将“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数

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作为“王政”主要目标，如果统治者能够做到“黎民不饥不寒”，那么“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二）“法行仁政”：道德与制度相辅而行

孟子说：“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

意思是仅有善良的动机，而没有配套的制度，是不能实施王政的，老百姓不可能得到仁政的实惠；仅有完备的制度，而没有人落实贯彻，那么制度也不可能推行下去。“法行仁政”的观点正确指出了道德动机与制度建设必须相辅而行，不可有所偏废。

瑞安与永嘉学派

瑞安是永嘉学派重要发祥地、重要复兴地和生动实践地。永嘉学派的思想源头周行己、传承者陈傅良、集大成者叶适、近代复兴者孙衣言、孙诒让等，都是瑞安人。

永嘉学派的分期和主要代表人物

“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温州古称“永嘉”，自古繁华，有“百工之乡”的美誉。宋室南渡后，温州由“僻远下州”变为地处京畿，贸易更加繁荣，成为当时全国四大海港之一。

宋代面临的特殊政治局面，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把目光转回到传统经学，以寻找重建文化自信和实现富国强兵的制度方法，永嘉学派应运而生。

一、准备期（1078—1162） 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

永嘉学派崛起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准备期，大致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开始，经历北宋灭亡，直到南宋高宗统治结束的绍兴三十二年（1162）为止。

（一）僻远下州——温州学子千里求学

北宋前期温州地区文化发展的限制：

- 1.距离文化中心（洛阳、开封）遥远，信息闭塞；
- 2.本地解额（向朝廷推荐参加进士考试的指标）太少，只有4个；
- 3.由于进士数量少，导致温州籍官员数量极少，缺乏影响力。

得益于王安石变法带来的太学改革，北宋元丰年间开始，温州众多学子怀着对真理和知识的渴望和追求，不远千里来到首都开封府就读太学。就读太学期间，他们接触到了北宋主流思想文化——王安石

新学、苏氏蜀学的熏陶。同时，他们听说开封西面的洛阳（西京），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思想学术——二程理学，有一部分温州学子前往洛阳拜入二程兄弟（程颢、程颐）门下。其中有九位代表性人物被称为“元丰九先生”。

北宋不同时期太学招生名额变化

宋仁宗时期（公元 1022—1063 年） 200 人

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 1068 年） 300 人

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 1072 年 王安石变法后） 1000 人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 1079 年） 2400 人

（二）伊洛之学——程颢、程颐及其思想

程颢（1032—1085），字伯淳。官至监察御史里行。嘉祐年间举进士后，任鄆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曾参与王安石变法，后因反对新法，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于此期间讲学。

程颐（1033—1107），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十四五岁时，与兄程颢同学于周敦颐。王安石当政时未被起用，与兄程颢在洛阳讲学。

二程长期在洛阳讲学，后来程颐又居临伊川，二人讲学于伊河洛水之间，因此其所创学派被称为“伊洛之学”。二程受学于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又同张载、邵雍等频繁交往，切磋学术，终于以孔孟思想为基础，吸收佛、道思想，建立起自己的理学体系，形成伊洛学派，

并成为北宋时期最大的学术派别。永嘉学派的周行己、许景衡曾求学于二程，借鉴了部分二程的思想。



(三) 俊豪先觉——元丰九先生

蒋元中、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许景衡、戴述、赵霄（瑞安人），张焯、周行己（瑞安人）。

“永嘉徒以僻远下州，见闻最晚，而九人者，乃能违志开道，蔚为之前，岂非俊豪先觉之士也哉。”——叶适《题二刘文集后》

1、士有成才：赵霄

赵霄（1062—1109），字彦昭，瑞安人，崇宁二年（1103）进士，官至辟廱正兼摄司业、承直郎。他任学官时，注意引导学者笃学力行，而不专务科举，因此“士有成材”。

2、违志开道：周行己

周行己（1067—1125?），字恭叔，瑞安人，自幼好读书，七岁

诵经书，十余岁学属文。少年时与同里许景衡等私淑林介夫先生。十四岁游开封求学：“年未十四五，出走京洛尘。当时黉堂士，教我文章新。”向当时的太学生（黉堂士）学习文章。十七岁（元丰六年，1083）补试入太学。至晚在元祐三年（1088）前，周行己已经赴洛阳向程颐问学。元祐五年（1090），程颐之父程珦去世，程颐命周行己接待吊唁的客人（“主客”）。元祐六年（1091），周行己登进士第，此后直到绍圣四年（1097）程颐编管涪州前，具体仕履不详，只知道为了方便就近向程颐问学，他主动请求担任洛阳的监水南余场一职。宣和二年（1120），任秘书省正字。其所著诗文收入《浮沚集》，今人编为《周行己集》。

道学不明，世儒蔽聪明于方册文辞之间，不知反身入德之要，仁义礼智根于心，而措于事业，致懵昧于理乱之机，颠冥于进退之义，道大悖矣而不知返也……明仲（戴述）资质刚明，少而有立，尝从洛阳程氏问学，知圣人之道，近在吾身，退而隐于心，合于圣人之言，若自有得。

周行己认为“洛阳程氏”之学即是“道学”，它否定了传统汉唐儒学注重记问背诵、章句训诂和诗赋辞章之学，而将儒学的重点回归到自己的身心修养，而修养功夫的核心又在于“心”。

3、执政忠直：许景衡

许景衡（1072—1128），字少伊，人称横塘先生，温州瑞安白门人。

北宋灭亡，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南逃，以临安府（今杭州市）为“行在所”建立南宋政权，是为宋高宗。有愆于北宋的覆灭，赵构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了某些北宋末期的政策，解除了对二程理学的禁锢，启用了一些徽宗朝不受重视的官员，其中就有瑞安人许景衡。

建炎元年（1127）高宗召许景衡为给事中时，对大臣说：“朕今不用文华之士，已令召许景衡于海滨矣！”

许景衡后在官至尚书左丞（相当于副宰相），他去世后不久，高宗感叹：“朕自即位以来，执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许景衡。”

【补充阅读】北宋以来的国家积弊

1、民生危机

宋朝长期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给民间造成严重负担。

冗官：宋朝采取崇文抑武的政策，并大量取士，官僚阶层人数大大增加。同时政府官制改革使行政架构臃肿，出现了多个官员等待一个职位的情况。

冗兵：政府将大量的失业农民招入军队，但缺乏对军队的训练，也不让军队屯田自给。军队战斗力低下，财政消耗巨大。

冗费：冗官、冗费必然带来冗费，大量财政支出用于官员与军队。陈傅良曾写过“方今经费，兵居十八，官居十二”。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北伐失败，与金朝“绍兴议和”，南宋除割地称臣外每年要向金朝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政府为维持运作大量增设苛捐杂税，这大大加重了民间负担。

为在实际上改善国计民生，永嘉学派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的民生思想，要求朝廷重视民生发展，反对苛捐杂税。

2、制度危机

北宋的灭亡与其僵化的体制有大关系。南宋仍然保持了北宋的制度，没有对冗官、冗兵、冗费现象进行改善。永嘉学派提出了“制度新学”以应对日益僵化

的社会体制。叶适认为要对古代制度“筹算手画，旁采众史，转相考摩”，“其说膏液润美，以为何但捷取科目，实能附之世用，古人之制可以复致也”。叶适认为参考古代的出众的制度，进行考证改良，让它们能够适应于现在的社会状况，促进社会制度完善。

（四）程学南传——其源亦同自出

北宋后期二程理学并不得志，学习二程理学也无法立竿见影地获得科举的成功，甚至还有一定政治风险。但以“元丰九先生”为代表的温州学人冒着极大的风险，在二程门下刻苦学习，终于掌握了代表儒学最新演进形态的宇宙论、格物致知思想（认识论）。

进入南宋后，二程理学在科场流行起来，温州人由于先于南方其他区域获得真传，故逐渐成为科举的优胜者。

“二程之学，龟山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氏传之朱氏，此其一派也；上蔡传之武夷胡氏，胡氏传其子五峰，五峰传之南轩张氏，此又一派也；若周恭叔、刘元承得之为永嘉之学，其源亦同自出。”——真德秀《读书记》卷三十一《张子之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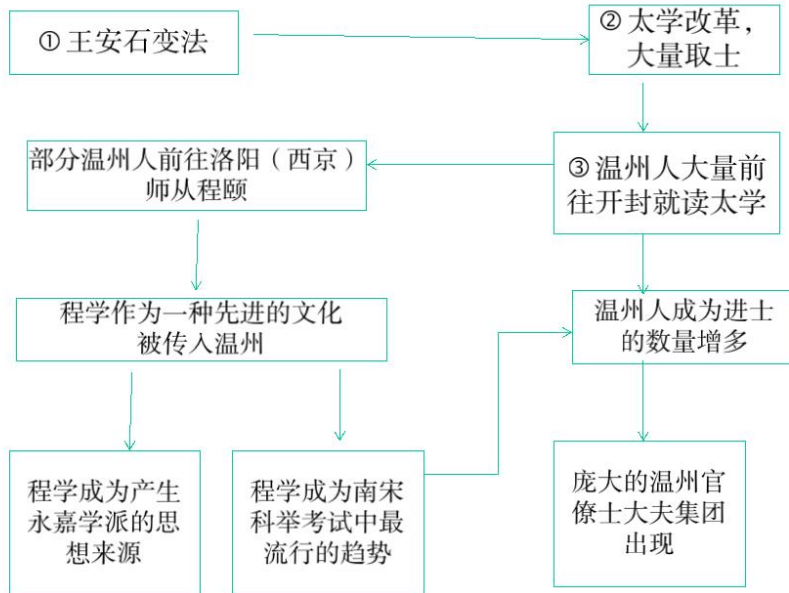
二程理学传入长江以南的三大分支

道南一脉（福建地区）：杨时——朱熹——真德秀

湖湘学派（湖湘地区）：胡安国——胡宏（五峰）——张栻（南轩）

永嘉之学（温州地区）：周行己、刘安节、许景衡——萧振——薛季宣——陈傅良——叶适

打破地理、知识、身份枷锁的路线图



二、定型期：南宋孝宗朝（1163-1189）

进入孝宗朝，一批温州籍学者在“东南三先生”之一吕祖谦的引导下，通过与永康学派陈亮的密切思想交流，逐渐从二程理学的窠臼中羽化蝶变，确立了永嘉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立地位。

（一）东莱启辙——探寻富国强兵经世致用之道

淳熙五年（1178）上半年，吕祖谦在临安担任秘书郎，刚刚进士登第的叶适，获得了当面向吕祖谦问学请教的良机，时间长达数月。此时，吕祖谦正在编纂一部北宋文章总集《皇朝文鉴》，他向叶适逐篇讲解了各篇入选文章的精髓和价值，传授了自己是如何通过文章编选反映北宋制度变迁、兴衰之乱的轨迹。这次当面教授，对叶适确立永嘉学派基本立场起到了关键作用。

孝宗乾道六年（1170）下半年，“东南三先生”中的吕祖谦、张栻在临安同朝为官，比邻而居，二人利用晚上时间讲学，听众挤满了客厅，其中陈傅良就在人群中凝神谛听。

叶适与吕祖谦在书房内相对而坐，桌上摊开《皇朝文鉴》书稿，叶适手持其中一篇苏轼《徐州上皇帝书》，问吕祖谦：“请教先生，东坡先生名篇如云，先生为何要选录此文？”吕祖谦答：“东坡此文，先抑后扬，大开大合，纵横驰骋，真为天下奇作！东坡的见识也是卓然超越于一般文人。他在此文中指出，由于本朝过度中央集权，削弱州郡实力，导致徐州这样的历代必争之地竟然兵力空虚，不足以战守。可惜当时朝廷没有重视他的建议。靖康之难时，金人从燕云地区长驱

直入，沿途州郡无一能与之野战争锋者，导致开封城破，二圣北狩，思之使人扼腕痛惜！我选录东坡此文，就是希望当今圣上不要重蹈覆辙啊！”

淳熙七年（1180）秋，浙学代表人物陈亮来访温州，与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叶适交流学问，把酒言欢。临别饯行时，陈亮留下一首《南乡子 谢永嘉诸友相饯》：

人物满东瓯。别我江心识俊游。

北尽平芜南似画，中流。谁系龙骧万斛舟？

去去几时休。犹自潮来更上头。

醉墨淋漓人感旧，离愁。一夜西风似夏不。

表达了对中原故土沦落敌手的愤慨，而南宋偏安江左后形成虚假繁荣，恢复中原的时机正在逐步丧失。可见，陈亮与永嘉学派诸子交流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富国强兵、北伐恢复的经世致用之道。

（二）于经无不合 于事无不行——薛季宣

薛季宣（1134—1173）字士龙（或作士隆），号艮斋，永嘉人。薛季宣六岁时，父亲薛徽言去世，由伯父薛弼收养，并荫补入仕。十七岁（1150）时，绍兴三十年（1160），授武昌县令，乾道八年（1172）七月，除大理寺正，不久除知湖州，乾道九年（1173）三月，因病重自请解任返乡，七月十七日卒于家。

薛季宣之父薛徽言是南宋高宗朝坚定的抗金主战派，任起居舍人时曾与秦桧在高宗面前争辩不宜对金投降议和，退朝后突发疾病去世，

赢得了富有正义感的士大夫的钦佩。

薛季宣从三条脉络继承了二程理学：他直接师从了程颐弟子袁溉，他的父亲薛徽言师从了二程的私淑弟子胡安国；他还曾在二程传人许景衡的女婿萧振幕府中任职。

二程——胡安国——薛徽言——薛季宣

二程——袁溉——薛季宣

二程——许景衡——萧振——薛季宣

【武昌县组织民兵抗金】

绍兴三十年，金主完颜亮单方面撕毁宋金和议南侵，薛季宣时任宋金交战前线的武昌县县令，率领军民，组织民兵抗金。他以五家为保，二保为甲，六甲为队，根据地形交通便利为一总，每一总设总首。以总为单位，定期举行射箭、击刺等军事训练，每五天派一总民兵接受县令薛季宣的检阅，成绩出色者得到赏赐。各总直接受县令指挥，修缮城墙，建设望楼，浚深护城河。武昌县曾奉上级命令组织民兵向前线军队转运输送粮草，由于组织科学，保障有力，一千八百人的民兵运粮队伍中仅有一人去世、一人轻伤，因此受到百姓的热情拥戴。

【“道无本末”“道不虚行”】

未明道揆，通于法守之务，要终不为无用。洒扫进退，虽为威仪之一，古人以谓道无本末者，其视任心而作，居然有间。然云文武之道，具在方册，其人存，其政举，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要须自得之也。（《答沈应先书》）

“道无本末”“道不虚行”显然是从二程理学“理一分殊”论发

展而来，强调“道”是彻上彻下的，贯穿了形而上世界与形而下世界，发用于事事物物之间。薛季宣进一步推论，既然“道无本末”，那么代表最高真理的“道揆”是“道”，而个人修养范畴的“小学”和“洒扫应对”也是“道”，“法守”更是“道”，三者并无本末之别、高下之分。“道揆”毕竟十分微妙艰深，或许难以把握，但是如果能精通制度之学，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对于“行先王之道”“平治天下”仍然是有益的。反过来说，因为“道体广大”，学者资质有限，如能领悟一枝一节，并且付诸实践，都是有益的，此所谓“道无虚行”，从而为永嘉学派的制度新学实践指明了理论方向。薛季宣的出现为二程理学的提升带来希望：“于经无不合，于事无不可行”，也启发了陈傅良、叶适。

三、鼎盛期：南宋光宗·宁宗朝（1190-1224）

南宋光宗、宁宗统治时（1190-1224），永嘉学派迎来鼎盛期。这一时期永嘉学派思想体系趋于完善，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同时由于在科举领域的成功，学派代表人物的社会影响力持续增长。陈傅良去世（1203）后，叶适接过永嘉学派大旗，并对学派思想进行总结和提升，完成《习学记言序目》，成为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

（一）群英荟萃：务求知古如君举，尤喜能文似水心

鼎盛时期永嘉学派群英荟萃，主要人物包括陈傅良、叶适、蔡幼学、戴溪、徐自明、张淳、陈武、徐元德、曹叔远等。

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学者称止斋先生，瑞安澍村（今塘下罗凤）人，南宋著名学者、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乾道八年（1172）进士，官至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兼集英殿修撰。陈傅良是永嘉学派承上启下的学术大家。著有《止斋文》《周礼说》《春秋后》《左氏章》《建院篇》《历代兵制》《毛诗解诂》《八面锋》等作品。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居士，出生于瑞安南门（今玉海街道水心街），先后师从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淳熙五年（1178）中榜眼。历仕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历官平江府观察推官、太学博士、尚书左选郎、国子司业、知泉州、兵部侍郎等职，曾参与策划“绍熙内禅”。叶适对外力主抗金，反对和议。韩侂胄开禧北伐失败后，叶适出任沿江制置使等职，节制江北诸州。因军政措置得宜，曾屡挫

敌军锋锐。累迁至江淮制置使。韩侂胄被杀后，以“附韩侂胄用兵”罪名被弹劾，遂返回故乡，从事讲学、著述而终身，完成《习学记言序目》，为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嘉定十六年（1223）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获赠光禄大夫，谥号文定。

蔡幼学（1154-1217），字行之，瑞安新城（今莘塍）人，乾道八年中进士，官至权兵部尚书（代理兵部尚书），卒谥文懿。是永嘉事功学派集大成者叶适的好友，又是陈傅良的重要弟子，相与关系密切，学术观点相近，遂成为永嘉学派继承者。《宋史·儒林》中有《蔡幼学传》。曾续《公卿百官表》，著《大事记》《编年政要》《列传举要》等，多佚。今存《育德堂外制》。

曹叔远（1159—1234），字器远，瑞安许峰（今曹村）人，少学于陈傅良，登绍熙元年（1190）进士第。曾任太常少卿、权礼部侍郎，官至徽猷阁待制，累阶至太中大夫，以通奉大夫、焕章阁待制致仕。

（二）天下一变：事功主于经世

【竹林精舍之会】

绍熙二年（1191），刚刚于上一年中进士的曹叔远来到位于福建建阳的竹林精舍，拜见了朱熹。两人随即发生了辩论。二人的对话被《朱子语类》较为完整地记录下来，涉及了道法关系、“是非”与“利害”的关系、功夫次序等多个重要哲学命题。

江西之学（指陆九渊心学）只是禅，浙学（指永嘉事功之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

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朱熹

乡间诸先生所以要教人就事上理会，教著实，缘是向时诸公多是清谈，终于败事……陈先生（指陈傅良）要人就事上理会，教实之意，盖怕下梢用处不足。——曹叔远

【《周礼说》上达天听】

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皇帝召见陈傅良，当面垂询：“闻卿在永嘉从学数百人。”光宗所说的是陈傅良早年曾在温州瑞安县梅潭（现属瓯海区仙岩镇）举办科举辅导的盛况。

陈傅良赶忙回奏：“臣无所长，只与士子课习举业，过蒙清问，不胜悚惧。”（我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学问，只能辅导年轻人准备科举考试，这样庸俗不堪的事情居然传到了陛下的耳中，并蒙陛下发问，真是惭愧惶恐之极。）

光宗却说：“知卿学问深淳，著书甚多，朕欲一见。可尽将来。”（你学问精深，也出版了很多书，可以挑选一些送给朕读一读。）

陈傅良退朝回家后，立即整理了一组文章，名为《周礼说》，分为“格君心、正朝纲、均国势”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由4篇论文组成，系统阐述了永嘉学派的社会改革主张，进呈光宗皇帝。

《周礼说》上达天听的消息不胫而走。程朱理学大师朱熹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周礼说》，认为“格君心”这一组文章观点正确，文采斐然。

【“场屋之权”尽归三温人】

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的一天，朱熹门人叶味道在建阳

考亭书院向老师辞行，回老家温州，参加三年一度的解试（乡试）。朱熹问：“赴试用甚文字？”意思是，你报考了经义科进士，那么选择在《诗》《春秋》《尚书》《周礼》《礼记》《周易》六部经典中选择哪一种，作为自己的“本经义”？叶味道回答，他选择了《春秋》一经。朱熹当即发表了一通感慨：

“《春秋》为仙乡陈、蔡诸公穿凿得尽，诸经时文愈巧愈凿，独《春秋》为尤甚。天下大抵皆为公乡里一变矣！”

叶味道是温州人，故朱熹以“仙乡”“公乡里”代称。永嘉学派学者陈傅良、蔡幼学极其擅长《春秋》经义的写作，朱熹称之为“愈巧愈凿”，名篇迭出，独步天下，蔡幼学甚至因此获得省试第一名（省元），因此，如果考生选择《春秋》经义应试，并且熟读陈傅良、蔡幼学的范文，注意揣摩学习其结构、文法、语气，便容易得到考官的青睐。

宁宗庆元三年（1197），有大臣向皇帝上奏，称叶适的《进卷》、陈傅良的《待遇集》完全主导了科举考试的评分标准，三十年中，三个温州人（陈傅良、蔡幼学、叶适）牢牢把持了科举考试的风向标。此奏一上，朝廷担心国家抡才大典受到少数人的操纵，竟下令全国销毁《进卷》《待遇集》二书的刻版，禁止印刷和流通。这件事情从侧面反映了陈傅良、叶适、蔡幼学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长期引领主导了科举文章的风气。

【《永嘉先生八面锋》】

叶适的《进卷》、陈傅良的《待遇集》今已亡佚，现在留下来的

永嘉学派科举时文集，只有《止斋先生奥论》《永嘉学派八面锋》，书中的文章对南宋面临的极其紧迫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危机和弊端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这些方案都是为民解难，为国分忧，永嘉学派的事功、经世都是出于公心而非私利，决不能简单地贴上“功利”标签。

宋人好持议论，亦一代之风尚，而要其大旨，不失醇正。永嘉之学，倡自吕祖谦，和以叶适及傅良，遂於南宋诸儒别为一派。朱子颇以涉於事功为疑。然事功主於经世，功利主於自私，二者似一而实二，未可尽斥永嘉为霸术。且圣人之道，有体有用。天下之势，有缓有急。陈亮上孝宗疏所谓风痹不知痛痒者，未尝不中薄视事功之病，亦未可尽斥永嘉为俗学也。是编虽科举之书，专言时务，亦何尝涉申、韩、商、孔之术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转型期：南宋理宗朝以后（1225—1276）

乾道八年（1174）薛季宣去世，此时浙学领袖是吕祖谦。

淳熙八年（1181）吕祖谦去世，陈亮、陈傅良成为浙学的代表人物。

绍熙五年（1194）陈亮去世，浙学的领袖变为陈傅良、叶适。

庆元六年（1200）程朱理学大师朱熹去世。

嘉泰四年（1203）陈傅良去世；叶适成为浙学的集大成者。

嘉定十三年（1223）叶适去世。此后浙学进入群龙无首的沉寂期。

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叶适系统总结了浙学的理论思考，进行了学理化的论证，整理了《水心外稿》《后总》，撰写《习学记言序目》，同时继续讲学收徒，获得了广泛的思想影响。

在朱子学已经显露出官学化势头的时代（1225—1276），曹叔远孜孜不倦地整理永嘉学派文献，传播陈傅良的思想。他于嘉定元年（1208）整理完成《止斋先生文集》，整理了陈傅良《周礼说》（三卷）、《开基事要》（十卷，又名《建隆编》），并作序、刊刻。嘉定五年（1212），曹叔远促成温州州学教授徐凤动用州学的“廩士羨缗”刻印此书。在潼川府路提刑任上，刊刻了薛季宣的文集《浪语集》。叶氏门人孙之宏整理《习学记言序目》。

五、永嘉学派融入元明清思想主流

叶适去世后漫长的六百年间，永嘉学派虽然已经停止了发展，也不再产生新的领袖人物，但它的思想观点和学术成就仍然受到了程朱理学的重视，并融入了元明清浙学的发展进程之中，由此得到了部分的传承。

永嘉学派主张“事求可，功求成”，反对空谈心性，主张将儒学的价值观运用实践于现实生活，实实在在地增进人民福祉，改革社会弊端，起到了纠正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末流流于空疏清谈弊端的积极作用。

（一）程朱理学吸收永嘉学派思想

元代朱子学者程端礼（1271-1345）曾这样评价永嘉学派代表人物薛季宣：

余谓士之谈诗书而略事功，其来已久，遂使俗吏嗤儒为不足用……余少读薛常州《行述》，窃欣慕之，盖其学本濂洛，其自得之实，于经无不合，于事无不可行，莅官文武，应机处变，政无巨细，靡不曲当。

程端礼批评从南宋后期开始，读书人中流行的“谈诗书而略事功”的偏向，削弱了朱子学改革客观世界、经世致用的功能；而他注意到薛季宣“学本濂洛”，是一个出色的学者，对如何解决南宋现实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危机，卓有建树，可以纠正程朱理学末流蹈空好高之弊。

（二）阳明心学对永嘉学派的学习借鉴

改造现实世界乃是发明本心、致得良知的最终归宿：“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尚何患其无致用之实乎！”在良知的指引下，儒者必然会自发地展开各种经世致用的活动，最终用儒学的礼乐秩序整合全社会：“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理？”

在王阳明看来，天理是知，实学是行，真知与真行本是合一的，同理，天理定义实学，实学成就天理，脱离实学的天理是空谈臆想，缺乏天理价值引导的实学只会走入利欲熏心的邪路。天理与实学，如同一根棍子的两头，你固然可以命名棍子的这一头叫天理，那一头叫实学，然而二者终究统一于一根棍子之中！理事不二，知行合一，南宋浙学的“事功”血脉至此又得发显。

六、历史评价

（一）鼎足而三

清代学者全祖望肯定了叶适与朱熹、陆九渊鼎足而三的地位。

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乾淳诸老既歿，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两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称鼎足。

（二）欲集诸儒之大成

南宋末期著名朱子学者黄震认为叶适是南宋学术的五大家之一，而且对朱熹、陆九渊、陈亮、陈傅良四家都进行了吸收和借鉴：

独水心混然四者之间，总言统绪，病学者之言心而不及性，则似不满于陆；又以功利之说为卑，则似不满于二陈；至于朱则忘言焉。水心岂欲集诸儒之大成者乎？

七、近代复兴

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近代中国，永嘉学派的独特价值引起了思想学术界的重视。在孙衣言、孙诒让父子为代表的一批晚清知识群体的努力下，在晚清掀起了复兴永嘉学派的高潮，由于这次近代复兴，永嘉学派的文化基因被人为地激活了，实现了在近现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孙衣言、孙诒让等清末学者复兴永嘉学派简介。

永嘉学派的主要思想和启示

一、哲学观点

（一）“事求可，功求成”

事功不能等同于功利主义。永嘉学派的事功是“事求可，功求成”，即正确的道德动机，在付诸实践中必须收获实效，努力实现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永嘉学派反对“有是非，无利害”，反对片面地突出动机的道德性和正当性，而完全罔顾这一动机是否具有可行性，是否能够收获实效，实实在在地造福于民。

（二）道法不相离与制度新学

“道”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和宇宙观，“法”特指制度。永嘉学派主张：天下无离道之法，离道非法也。古之治天下者纯任道，后之治天下者纯任法，儒者固有是言。自儒者之爲斯言也，而始离道于法。

有些儒者错误地认为，三代圣人不需要“法”就能用抽象的道德原则治理天下，三代以下君主仅仅依赖制度治理天下，而完全废弃了道德原则。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道不离法，法不离道；三代圣人也必须将道德原则落实在精密复杂的制度安排之中，才能治国平天下。现在的人要学习三代之道，必须从三代的“法”（记载于诗、书、周礼、仪礼、尚书等经典之中）来把握。

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永嘉学派开创了“制度新学道”：永嘉学派从《周礼》和《左传》里面吸取了营养，又研究汉唐时代的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制度和官僚制度、政治制度哪些不同总结出反面教训，

不但在史书里面去钻研，而且自己还设计制度，模拟制度运行，互相之间还讨论、切磋，他们的学问写出文章来非常漂亮，思想有深度，内容很丰富。

（三）道无内外，学则内外交相成

“道无内外，内外交相成”是叶适从《中庸》“合外内之道也”中申发出来的哲学方法。

“内”与“外”的界线是“身”，所谓“内”指“身”个体的主观的道德修养和学习，即《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外”指“身”以外，外延非常广泛。程朱理学将“外”定义为个体在客观世界中修养身心，特指《大学》“修身”；永嘉学派则在此基础上，扩展为个体在进行自我身心修养的同时，主张开展广泛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其实就是《大学》的“齐家、治国、平天下”。

叶适反对“心包万理”“心外无物”，理学认为人心先天地具有天理，这是不对的；人对真理的探索和认知，是通过与外部世界不断互动探索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人心并不存在关于最高真理的现成答案。因此叶适反对顿悟、直觉等认知方式，而提倡通过外部经验来源源不断地获得知识。永嘉学派不但把道德伦理、人情物理乃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一切知识都看作是工夫的对象，也把参与社会实践、社会改造纳入“合外内之道”的“外”的范畴。个体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应该与“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头并进，二者始终相辅相成。

“道”是无内外之别的，贯彻表里的。只有“家齐、国治、天下平”，

主体对“道”的认识才告终结，儒学的工夫论（认识论）不仅是个体的道德修养、博闻多识，而是一个复杂的、宏大的社会实践进程。

（四）天理分数论

陈傅良说：“识得三两分，便有三两分功用；识得六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却有全然识了，为作不行，放低一着的道理；绝无全然不识，横作竖作，偶然撞着之理。”真理是与真理的“功用”联系在一起的，认识了一分真理，必然能收获相对应的一分实效，这种观点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哲学特征。

美国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认为：“说‘它是有用的，因为它是真的’，或者说‘它是真的，因为它是有用的’，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简而言之：“有用就是真理。”

同时，陈傅良把具体的事事物物之理，定义为“天理”的“分数”，“天理”相当于分母，具体的事事物物之理是分子，对具体的事事物物之理的钻研不断取得成就，则分子越来越大，无限逼近分母，最终达到分母的数值，则是天理得到了全体大用彰显；在分子达到分母以前的各个阶段，尽管不能把事事物物之理就称作是天理，却可以看作天理不可缺少的部分。

二、政治思想

永嘉学派的制度新学，主要是为了解决南宋当代的制度危机，因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见解的政治思想。

（一）坚定的抗金恢复主张

南宋进入孝宗淳熙年间之后，朝廷认识到南宋国力弱小，尚不具备在短期内全面北伐恢复故疆的能力，而应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加强自身国力，全面改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于是士大夫议论的主流从“主战反和”嬗变到“自治待时”。

薛季宣担心“隆兴和议”之后很多人认为天下太平，对军事防务忽视懈怠：“人情苟安，不知为备之说，欲为守御，固当力施行之。言议悠悠，何益于事！”对于已经屯守精兵的城池、要塞，还要注意是否具备长期坚守的条件：“冲要虽有重兵之屯，坚城之守，中无民力，且乏粮械之资，则亦未可谓之万全。”

陈傅良反对把“恢复”归结为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结民心以祈天命之谓”，是决定国家治乱、社稷安危的系统工程。“恢复”的前提不仅是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还要统筹解决南宋存在的“冗官、冗费、冗兵”三害，而解决“三害”的最大意义是“宽民力”。他说：“靖康至于绍兴，尝用兵矣，则有讲和之说起而为梗。故上之号令相反而不能定，下之朋党相倾而不能合。若夫宽民力，谁独无是心哉！断之而无异论，行之而无后患，莫过此者，而何疑不决？”（《吏部员外郎初对札子》第三札）自北宋钦宗靖康至高宗绍兴年间，朝野各

派对于主和、主战的意见分歧，唯独谈到减去人民负担、让人民休养生息的“宽民力”，都是异口同声赞同的，但是对这样高度共识的大事，朝廷却迟迟不下决。

叶适则认为，“固本自治”论无形中淡化了“恢复”的主题：“为复仇之论者有矣，不过欲斗胜负于兵革而已，自用兵以来无他画也。为固本之论者有矣，不过欲久和好以无事而已，自通和之外无长虑也。”实际上是另外一种主和论。叶适主张在“固本自治”的基础上“抗首北出”：“财以多为累，兵以多为累，法度以密为累，纪纲以专为累；更之则慰民心、苏民力，解缠起痼，兴滞补弊，则二三年之间，可以抗首北出，而取燕之利在掌握矣。”（《水心别集》卷一〇）首先通过去除财政危机、兵多不精、法度不良这“三害”，达到“慰民心、苏民力”的目的，然后发动北伐。

韩侂胄于开禧二年（1206）四月发动对金北伐，以恢复疆土为号召；六月，叶适被任命为江东路安抚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七月又兼沿江制置使。十月，金军大举反攻，攻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众多州军，屯军于建康府对岸的六合、定山、瓜步，窥伺江南，建康府内军民惶惶不可终日，士气低落。

在这种情况下，叶适命门人厉仲方（时任左领卫中郎将），募集建康府的市井豪杰之士，共二百人，乘坐小舟，于半夜渡江劫寨偷袭，杀伤甚多，捷报传来，鼓舞了江南军民的抗金士气。由于叶适主持的长江防线无懈可击，江北的宋军不断袭击金军，金军不得不于冬天撤回到淮河以北。叶适丝毫没有麻痹大意，在长江以北建立石跋、定山、

瓜步三个军民结合山水寨，收留难民，屏障江南。

（二）天子无私论

陈傅良认为皇后与太子虽然是皇帝的至亲，但是也不能成为皇权的延伸或者化身：“王者以天下为家，岂容一家自为分异？”皇帝的家庭成员在生活上应该与皇帝一起，而不应自成体系。陈傅良在《经进周礼说·格君心其四》中说：“天子之元子，毋过命士，与公卿大夫之子，共齿于学。”而且皇后与世子，“自牧甚卑，则以能下人为家法”。在生活待遇上也是如此，从《周礼》膳夫、酒正、司服的职掌可以看出，皇后、世子与皇帝的饮食、衣服都由同一个系统供应，秦汉以后则否，皇帝、皇后、世子分别由内廷三套机构供应服侍，因此导致了靡费，助长君主的奢靡之心。

陈傅良主张，皇帝及皇室不应该有自己的私产，皇帝的一切是天下的，冢宰为首的官僚体系供应皇帝与皇室的一切享受、待遇，皇帝的一切财富都由这个官僚体系统一管理，皇帝不能绕过这个官僚体系直接汲取天下的财富，更不能离开官僚体系的监管。《周礼》主管财政的部门共有玉府、内府、外府。玉府是“掌天子器用财贿燕私之物，及受贡献以备赏赐”，但是和一般国库收入一样归太府管理，“以见王者以天下为家，贡赋之入，无彼此之殊。”纳入太府之后，“属于大府则日有成，月有要，岁有会，司会有废置诛赏之典，夫安得不节？”但是《周礼》的这一原则，在秦汉以后全部被破坏了，汉高祖自置汤沐邑，专供一私奉养，不纳入国家经费；东汉灵帝作西园万金堂，专门聚集私藏，这些私人财产由宦官、外戚管理，“外人比较不及，则

伤财害民，岂细事哉！”

（三）自治说和对过度中央集权的批判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发展到宋代，呈现出中央高度集权，而地方则高度的分权，不能调动任何资源。宋代的中央集权程度超过明清两代。叶适认为，应该适当地赋予州郡权力，使其既可以充当中央的屏障，又不至于强大成为反抗中央的军阀藩镇。

叶适直接用“自治”来概括西周的封建制下的邦国政治的特点。他说：

“方天下为五千里，而王之自治者千里而已，其外大小之国千余，皆得以自治。其正朔所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朝会贡赋，贤能之士入于王都，此其特大者也，而其生杀废置犹不能为小者，天子皆不预焉，而天子之自治，亦断然如一国。”

周王及其朝廷只负责中央事务（礼乐征伐），而各邦国的行政、用人、财赋等权一切自治，周王不能干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宋的地方行政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导致活力不足。因此，叶适呼吁改革南宋的地方行政制度，重新分配中央与地方的事权。

“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县行其一县，赏罚自用，予夺自专，刺史之问有条，司隶之察不烦，此所以不害其郡县而行伯政也。”

赋予州、县完整的地方行政权力，州以上的监察机构应该精简对地方的监察，革去文山会海，不要削弱地方权力，更不能越俎代庖。

陈傅良批判“王人虽微，必序乎诸侯之上”。陈傅良研究《周礼》发现，在很多朝廷典礼中，来自地方诸侯的地位都高于周天子直

属的官员——“王人”，陈傅良说，西周的这一制度安排目的是：“夫然后内外之势一，而士无缺望”。因此，陈傅良大胆提出：

孔子作《春秋》，王人虽微，必序乎诸侯之上，始不以爵为差，凡以尊王，非周之旧典也。

陈傅良认为，孔子在《春秋》里尊王，虽然是对当时礼崩乐坏的趋势的反动，但矫枉过正，“尊王”太过，在后世引发了权力与资源的分配倒向中央，君主无限制、无原则地吮吸地方资源，其历史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在传统中国，“尊王”是意识形态上不可触碰的高压线，陈傅良敢于从提高地方活力的角度，质疑“尊王”应有的界限，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

（四）儒吏说和儒家的自我革命

宋代，儒家士大夫通过科举考试当“官”，但是任期很短，两年算是正常任期，经常是几个月就调动了，因此对地方事务不熟悉。真正熟悉法令、案例的是胥吏，但吏想升为“官”很难，却父子相继，出现了叶适批评的“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现象，凸显了儒家士大夫缺乏经世致用能力的窘境。叶适提出，可以让那些进士考出来的那些官去当吏，就是刚考出来的这些进士和“任子”（靠父亲和祖父的官职获得荫补）出身的这两种人当吏，三年满了以后能很出众的可以来当州县官，可以越级提拔。

叶适已经意识到当时的“官”缺乏治国理政的本领，“吏”掌握了技术性知识却缺乏上升空间，只知道营私舞弊。这种现象如果不打破，南宋的半壁江山就有断送的危险，这一点被叶适预言到了。

三、经济思想

（一）义利之和：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

义，指价值观；利，指主观动机所产生的客观效果。

永嘉学派提出“功求可”“事求成”，要求不仅关注动机的道德性，也要结合效果的成败，综合考虑，反对片面根据动机的道德性来进行价值判断。

“义利之和”语出《易·乾卦·文言传》，永嘉学派将这句话理解为：正当的价值观“义”应该产生实际的利益；追求实际的利益应该以正当的价值观为指导，“义”与“利”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能割裂开来。叶适批评西汉董仲舒“明道不计功，正谊不计利”。

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

古人为百姓造福谋利，但是不自居其功，可见其造福谋利的动机中没有自私的成分。因此，“谋利”“计功”是“正谊”“明道”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道义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功利，则道义亦成为虚伪的道义。

（二）工商皆本，重视富民

永嘉学派活跃的南宋，农业经济占据主流，但工商业也已十分活跃，而封建国家、官僚士大夫和地主阶级对商人同样非常鄙视，认为商业是“末”，而农业是封建国家的根本，商业的发达会妨碍农业发

展，扶植商业就是本末倒置。因此，商人的社会地位低下，国家机器对商人几乎是予取予求，更谈不上扶植鼓励。

叶适认为，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划分并不是社会地位尊卑的划分，工商业者有权利进入统治阶层，国家机器不应该将他们摒绝于政治领域之外。国家应该从这个群体中选拔人才进入统治阶级队伍。他说：“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烝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所谓“无类”，就是国家选拔人才不能有职业的歧视，对工商业者不能歧视、抛弃、隔绝，要给他们参与政治的机会。

传统儒学过于歧视和轻蔑“富人”“富民”的社会地位。他认为上古圣王时代，君主负责养民，但到了后世，君主失去了养民的职能：“县官不幸而失养民之权，转归于富人，其积非一世也。”叶适的理由是，富人向穷人借贷、出租田亩、雇佣穷人为仆役帮工，很多非生产性劳动者（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依赖富人谋生。

（三）反对“耻言财利”，主张士大夫学习理财

南宋士大夫对担任财政经济职务的鄙视，譬如南宋朝廷掌握了大量仓库、磨坊、酿酒工坊、盐场、茶场、矿场等机构生产、销售相关的国家专卖物资，并相应设置了大量官员管理，他们要保证专卖物资的生产、储存、销售，还要保证盈利，不致亏损，陈傅良指出这些职务其实非常重要，工作内容极其繁琐，与国家财政收入息息相关，因此南宋朝廷对这些职务的迁转和待遇都给予了优待。

奇怪的是，士大夫对这些职务非常鄙视：

“今夫皆州县官也，皆得以察举于其长，而由幕职教授若曹官令佐得之，则人以为宜，繇仓库务官，则人以为怪。皆在京官也，皆得以选用于其上，而由检鼓诸院得之，则人以为宜，由审计榷贷之官，则人以为怪。”

同样是提拔为州县长官，同样通过上级的考察选拔被提拔为州县长官，如果候选人是幕职官、教职、曹司、县令、县丞、主簿，大家就觉得顺理成章；如果是管理仓库和场务的官员，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担任这种卑贱职务的人不应该提拔为州县的长官。在京官选拔过程中，也有这样的怪象。因此他说：“筦库之士，自古卑之矣，而今为甚……夫以征榷之人，岁累十百倍于古，而其官司之劳亦累十百倍于古，国家方加利焉，而卒卑于士议如此，则自爱者宜知所择矣”稍知自爱者都回避担任这一类职务，使得这一方面的人才日益凋零。

由于经济财政事务长期受到轻视和鄙薄，导致士大夫中出现了“学、政判然为二”的现象。叶适说：

其平居道先古，语仁义、性与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观耳，特科举之余习耳。一日为吏，簿书、期会迫之于前，而操切无义之术用矣。曰，‘彼学也，此政也’。学与政判然为二。县则以板帐、月桩无失乎郡之经常为无罪，郡则以经总制无失乎户部之经费为有能而已矣。【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十一《经总制钱二》】

士大夫平日高谈道德性命，津津乐道三代之治，对经济事务漠不关心；及至担任地方上的知州、知县等官，根本不懂如何通过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只知道应付上级下达的各种征集、转运指令，以按时征

缴各类税费作为最大的政绩。长此以往，吏治日趋毁坏：“而今也推是术以往，风流日散，名节日坏，求还祖宗盛时，岂复可得！”【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十一《经总制钱二》】

针对这种弊端，永嘉学派提出制度新学，希望培养士大夫精通财政事务、掌握发展经济的本领。

（四）反对官府与民争利，尊重市场规律

南宋商业经济发达，叶适观察到，在某些情况下，政府调节市场是完全必要性。他以湖南地区的粮食流通为例，在二十年中，即使获得丰收，中等资产的家庭也没有能力储备余粮。原因是，湖南水运发达：“江湖连接，无地不通，一舟出门，万里惟意，靡有碍隔。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粮食贸易极为活跃，农民留足口粮外，其余的米全部交给粮商交易：“大商则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舰而同营；展转贩糶，以规厚利；父子相袭，老于风波，以为常俗。”因此，一旦遇到欠产年份，百姓由于平时不储备余粮，很容易在青黄未接时出现缺粮情况。叶适建议，湖南路的转运司和提举常平司应该负起责任：“此事诸司当任责，而漕司为一路通融有无之处，其责尤重。”在丰收年份，官府要到产粮地加强收籴，防止粮食过度外流；遇到荒年则将官府掌握的仓储粮食平价出糶。

但是，永嘉学派也认为，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干预是有限度的，不能将自己定位为市场交易的一方主体，更不能出于谋利目的而干预市场活动。

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

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学周公之法于数千载之后，世异时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财也。【《水心别集》卷四《财计下》】

王安石看到《周礼》“泉府”之法，以为西周周公执政时，是政府操纵了市场经济，而没有考虑到政府早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以及操纵市场所需要的良好的动机。同样是操纵市场，周公不以为政府自身牟利为目的，而旨在为天下百姓造福谋利；后世小人运作市场，只会为官僚集团和胥吏群体牟利，剥削的对象却是全社会。这样看来，还不如把市场还给商贾们运作。

四、文学成就

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都以文学才华见长。他们不但擅长运用文学艺术，建立了崇高的道德声望，还因擅长时文写作而获得了后生士子的追捧。早在乾道元年（1165），王十朋就指出：“吾乡谊理之学，甲于东南……士子群居学校，战艺场屋，笔横渠而口伊洛者纷如也。取科第，登仕籍，富贵其身，往往多自此途出，可谓盛矣！”这就说明，“元丰九先生”以来的二程学统，使得温州士子善于用程学的义理写作散文。

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薛季宣虽然英年早逝，文名不显，但观其《雁荡山赋》句法自然灵活，流畅优美，意境清闲雄阔，成就极高。

郑伯熊也被时人认为擅长时文。南宋思想家、文学家陈亮称赞他：

“朋友间有得其平时所与其徒考论古今之文，见其议论宏博，读之穷日夜不厌，又欲侵木以与从事于科举者共之。”可见其作品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一）一扫“陈编宿说”

陈傅良是薛季宣的高足，也受教于郑伯熊，故其散文创作和诗歌创作也有很高的成就。

乾道三年（1167），陈傅良在仙岩梅潭讲授科举时文，一扫“陈编宿说”，新文风和新内容如同“奇意芽甲，新语懋长”，使学生“骇未曾有，皆相号召，雷动从之”，陈氏“由是其文擅于当世”。楼钥在《陈傅良神道碑》中强调陈傅良著作“洛阳纸贵”，对南宋时文产生巨大的影响：“公自为举子业，其所论著如《六经论》等文，所在流播，几于家有其书。蜀中文学最盛，读之者无不动色，文体为公一变。”叶绍翁明确指出陈傅良：“经义敷畅厥旨，尤长于《春秋》《周礼》。”吴子良评价陈傅良：“止斋之文，初则工巧绮丽，后则平淡优雅……后学但知其时文而已。”

绍熙三年十一月，陈傅良又奉特旨，代光宗皇帝撰写了赞颂太上皇政绩的《至尊寿皇圣政序》，这篇文章本已命翰林学士拟进草稿，但光宗皇帝读了初稿很不满意，改命并非翰林学士的陈傅良另起一稿。十二月五日，光宗诣重华宫（德寿宫遗址），向太上皇（即孝宗）进献《至尊寿皇圣帝玉牒》《至尊寿皇圣帝圣政》《至尊寿皇圣帝会要》三部书。陈傅良参加了这次进献仪式，并奉光宗之命在太上皇孝宗面前朗读《圣政书》片段。在朗读间隙，陈傅良偷偷抬头看了一眼御座

上的太上皇，发现：“寿皇色甚康，顾视久之！”孝宗对这篇文章非常满意。

（二）南渡卓然一大家

四库馆臣评价叶适的散文，“文章雄贍，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家。”

叶适的议论文主要针对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弊端，引据史传，衡情度理，提出自己的主张。叶适撰文，不落窠臼，力求自出机杼，自抒胸臆，造语警策。其淳熙五年《廷对》云：“君听在乎广大，臣言贵乎切近。臣闻庸君行善政，天下未乱也；以圣君行弊政，天下不可治也。”叶适认为君主的个人道德修养和智力判断并不能决定天下的治乱，而应该与建立一套有效的体制相互配合，天下才能得到治理，显示了叶适的永嘉制度新学的鲜明立场。据说，孝宗看到这段话后颇为吃惊：“上微笑道：‘即是圣君行弊政耶？即是庸君行善政耶？’”叶适本来应该是状元，因孝宗有此评论有关部门就将他降为榜眼（第二）。

叶适论《理财》别具一格：“理财与聚敛异，今言理财者，聚敛而已。故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犀利地指出了南宋财政日益败坏，人民负担不断加重的症结所在，故南宋学者黄震称赞此语：“此天下之名言。”他的政论文以经史之学为基础，并能从实际出发，提出政见，分析细密而有条理，语言简朴而厚重有力。

叶适还擅长撰写墓志铭。在形式上，叶适发明了将两个人合撰一铭的体裁，即《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和《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

别开生面。南宋著名学者真德秀仔细研读了《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写下了大段读后感：“永嘉叶公之文，于近世为最，铭墓之作，于他文又为最。著作正字二刘同为一铭，笔势雄拔，如太史公叹咏悠长，如欧阳子于他铭，又为最！”真德秀是朱子学的传人，在思想学术上自然与叶适对立，曾批评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为“放言”，但他毫不掩饰对叶适的墓志铭的由衷喜爱和衷心推崇。

（三）永嘉四灵

南宋孝宗、光宗两朝及其后的若干年，南宋诗坛产生了深受永嘉学派影响的“永嘉四灵”，主要代表人物赵师秀、徐照、徐玑、翁卷等四人艺术旨趣相投，诗格相类，今人将他们的诗作合编为《永嘉四灵诗集》。

“永嘉四灵”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叶适文学理论的影响。叶适认为程朱理学兴起之后，诗词被看作“发明义理”的工具，而诗词格律形式和艺术技巧则被贬为“末技”。此外，北宋后期黄庭坚等人开创的江西诗派以杜甫为宗，但追求字字有出处，过分重视用典，而不重视对外在景物描摹，进而创造意境，末流往往诗味淡薄，喜掉书袋，而不能直抒胸臆导致了诗学的倒退。而“四灵”的诗歌多艺术旨趣和生活韵味，永嘉四灵的出现是对上述两种弊端的反思。他们注重结合客观外物创作新的意境，从而抒发性灵：“上下山水，穿幽透深，弃日留夜。”扭转了诗学的倒退。

赵师秀（1170—1219），字紫芝，号灵秀，永嘉人，宋宗室。赵师秀最出名的一首诗是七绝《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

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写了梅雨之夜在家中等候友人、友人却失约不至一事，普通的题材，平淡的写法，却成就了千古名篇。

五、史学成就

叶适认为《书》《诗》《春秋》等六经所记的都是历史，只不过文体不同罢了。如“《易》者，易也。夫物之推移，世之迁革，流行变化，不常其所，此天地之至数也”讲的是历史变化的规律。《书》则是尧、舜、三代的历史，三代的“治乱兴衰，圣贤更迭，与夫梁、封之大恶”也已尽载其中。《诗》可以当作周史看待，“言周人之最详者，莫如《诗》。故夫学者于周之治，有以考见其次第，虽远而不能忘者，徒以其《诗》也”叶适谓《周礼》是“六卿之书”，“其于建国、设官、井田、兵法、兴利、防患、器械、工巧之术咸在，凡成、康之盛，所以能补上世之未备而后世之为不可复者，其先后可见，其本末可言也”《周礼》就是记载西周各种制度的可靠史料。叶适认为古代没有经、史的区别，只有史体的不同，直到孔子死后，“统纪之学废”“修其业者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而已”，此时才产生了一批专业的史学家，经学与史学从此分道扬镳。可以说，永嘉学派是较早历史上提出类似于“六经皆史”观点的流派。

永嘉学派的历史研究重心在于两宋本朝史。

陈傅良对制度的沿革和细节进行追根溯源，厘清其源头、沿革以及未来改革的切入点，形成了《皇朝大事记》《皇朝百官公卿拜罢表》

《皇朝财赋兵防秩官志稿》《建隆编》。上述著作的单行本都已亡佚，但马端临编辑《文献通考》这部制度沿革方面的巨著时，从陈傅良的著作、奏札、记序等文中大量摘录了相关见解，其主要内容点校整理后收入《陈傅良先生文集》附录一，从中可以看到陈傅良对商税、盐法、酒税、茶税、契税、和买、市舶、地方财政上供中央、漕运、任子荫补、考课选举、兵制都进行了梳理考证，而对于财政政策的演变用力最深。

叶适的本朝史研究散见于《水心文集》《水心外集》《习学记言序目》中，尤其是《水心外集》所收各篇论文对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制度梳理和反思批判，这些重要意见早在南宋末期至元初，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黄震曾称赞《水心外集》《实谋一篇》中“皆熟于治体之言”，《财总论二篇》“此皆精于才用本末之言也”。

永嘉学派思想的现实价值和当代启示

一、继续秉承“以义和利”的义利观

我们要遵照习近平同志关于永嘉学派“反对义利两分”的指示，始终秉承义和利的辩证统一关系，既反对脱离价值观、为了利益而求利的功利主义，也要反对“有是非，无利害”这种片面强调主观动机的正确性，而完全不考察其客观效果和可行性的假道学。

二、温州创业冒险精神的早期形态

永嘉学派的早期开创者“元丰九先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抛家舍业，从温州来到中原腹地开封，这需要极大的创业精神。这种创业精神为温州文化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奠定了基础，既到外部世界去实现自我，也接纳外部世界的人和知识进入本地。

三、要抢抓机遇谋发展

想要改变命运，就要抢抓机遇。北宋神宗朝的太学法改革、宋室南渡，都是温州人无法把握的宏观变局，但机遇出现，就要及时把握、充分运用。

四、学习永嘉学派讲求实效，不务虚名的精神

12世纪下半叶的南宋孝宗朝，局处一隅惊魂甫定，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暴露。危机的根源是什么？解决的办法又在哪里？儒家士大夫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认为，所有危机皆由人心不古、道德沦丧而起，当务之急应“以正心诚意为体”“讲明义理以淑人心”，要求人们“修心”，偏向内求，老实做个好人。但

在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看来，片面追求动机的道德至上无济于事。他们主张“事求可，功求成”，善良的道德动机一定要能够实践于改造现实社会和改革弊政之中，并且获得最佳的实效。面对社会一蹶不振，陈傅良深刻反思制度之弊，认识到只有民富才能国强，确立了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主旨。他的学生叶适，在重农轻商的浓郁思想氛围下，旗帜鲜明地主张通商惠工，为近千年之后的温州现象其道大光埋下了伏笔。

五、永嘉学派始终保持开放性、流动性，反对固步自封

永嘉学派是在充分汲取二程理学、王安石新学等主流思想和新兴思潮丰富营养的基础上茁壮成长起来的。永嘉学派始终坚持开放对话的心态，虚心向吕祖谦、陈亮学习，与朱熹对话，最终成为三足鼎立的哲学流派。

六、学习永嘉学派鲜明的批判性和革命性

永嘉学派，尤其叶适，经过长达三十年的探索，最终意识到了与朱熹在理论上难以调和，浙学必须在理论预设层面上驳正理学，特别是理学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心性论和“道”论。因此永嘉学派用学理论证、经典阐释的方式，以学术研究的形式阐明浙学的基本立场和核心要旨。